



本报记者 谢佳航



舳舻衔尾相连,延绵千里不绝。一艘艘满载粮食的漕船,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号子,曾是运河上盛大的场景。南方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输到京城,储存于粮仓,维系着明清两朝的国计民生。这些粮仓如今在通州的哪里?古人又是如何全方位管护粮仓、守护漕粮安全?这些粮仓又承担着哪些重要功能?本期通州冷知识,带您走进通州漕运仓储往事。

南北物资集散之处

翻开通州地图,能看到中仓、后南仓等带“仓”字的地名,这些地名并非凭空而来,背后蕴含着通州丰富的漕运仓储文化。据了解,“中仓”因明永乐年间设立皇家粮仓中仓而得名。历史上,这里曾是漕运仓储重地,也是通州八景之一“万舟骈集”所在地。此处不仅是京城所需粮食的储运中心,也是南北物资集散之处,南北文化激荡碰撞之地。

明永乐七年(1409年),朝廷设立通州粮仓,经过多次扩建,正统元年(1436年),定通州仓名。清初,通州有三座粮仓,即西仓、中仓和南仓。清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大运南仓并入中、西仓。此后,通州有大运中仓和大运西仓两座粮仓。

《通州志略》记载,大运中仓“在旧城南门里以西。永乐年建”。目前仅存其遗址。遗址西起新建街,东至南街,北起西大街,南至梧仙观胡同及周仓庵胡同。部分仓墙尚存,旧址清晰。大运中仓的管理人员在此居住、生活,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产生,进而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繁荣。在大运中仓西面渐渐形成了中仓胡同、烧酒胡同、麦芋胡同等几条胡同。

其中,中仓胡同东起中仓路(曾名新建街),西到大烧酒胡同,北到西大街,胡同呈“工”字形。明代已经初步形成街巷,依巷子宽度大小,南称大仓胡同,北称小仓胡同。1989年,将大仓胡同和小仓胡同合称为中仓胡同。1991年旧城改造时拆除,1994年在中仓胡同和周边几条胡同原址的基础上建起了中仓小区。

除了中仓,通州区北苑街道辖区内有一社区名为后南仓,同样是漕运仓储的重地。天顺四年(1460年),明廷在大运西仓南边新建了一座粮仓,名为大运南仓,也被称为后南仓。有些专家认为,名称里的“后”并非指代方位,而是区分粮仓修建的先后顺序。

防汛防火重中之重

通州粮食仓储从南方漕运而来的数百万石漕粮,是统治者能够直接调用的粮食,所以各朝对通州仓的安全十分重视,尤其是将防汛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为从根源规避水患,通州城利用潞水(北运河)和通惠河设计了护城河。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,“户部郎中于仕廉周视两城隍并可池,请引通惠河注之。沼浚三千三百余丈,加深二尺许,广视深四倍,建闸一、桥四。”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护城河防御体系,不仅解决了通州城西护城河和南护城河的问题,而且还“积水丈余”,具备运输的条件。史书也明确记载该水道连接了土坝与中西两仓,具有水运功能。从万历二十二年后,护城河可通航漕舟,大幅省去陆路转运粮食的人力物力成本。

除护城河体系外,通州古城还十分注重对水的利用。城北依托西海子、东海子两大湖泊,城南则在东西水关及粮仓附近设置了四处水渠。这样的水系设计,不仅兼具军事防御、防洪排涝、漕粮运输、城市消防等实用价值,还能雕琢城市风貌、调节局部小气候,实现了安防、民生与生态景观的多重效益。

夏季多雨时节,通州粮仓很容易遭受水涝、霉变之灾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对天气的预报能力,防洪能力都有限。主要通过修缮通州城,兴修运粮道路,加固粮仓的仓墙和路面等做法,最大限度防止粮仓被淹和路面泥潭的情况出现,确保粮食安全和运粮顺利。

此外,火灾是粮仓的另一大隐患。在防火设计上,粮仓内每间仓廩之间相隔三丈,防止一间失火而殃及其他仓廩。仓廩之间还挖有名为“水道”的通道。这些水道直通仓沟,仓沟再与河道相连。同时针对一些距离“水道”较远的仓廩,还会修建水井,以备灭火之用。

这些多举措保护的粮仓都承担着哪些重要功能呢?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理事贾长宽介绍,储存在通仓的漕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供给京城各类人员口粮。明代漕粮主要按月发放给拱卫京师的官军。清代供养体系更为庞大,朝廷依靠漕粮供给宗室勋贵、八旗官兵及其数十万家属,满汉文武官员均按品级领取禄米;同时各级衙门公用粮、宫廷马驼饲料、皇陵守卫官兵口粮,也取自京、通二仓。

其次是应急调拨充作军储。在明朝,除京军月粮之外,朝廷有时还从京通二仓调拨部分粮食,充作边镇军储。明前期这种调拨并不常见,土木之变后北疆战事吃紧,漕粮调拨量持续上涨,嘉靖年间达到顶峰,大量漕粮运往北方边镇储备。在清代,漕粮常被调拨充当各地驻军的军饷,也会通过漕粮与地方米粮互换抵兑,就近补给各地军队。

除此之外,在明朝,当北京粮价太高时,朝廷一面打击囤积居奇,哄抬物价的行为,一面低价将漕粮出售到市场,平抑物价,保持经济的稳定。明代还常动用通州仓余粮救济京城及附近州县饥民,清代遇灾则调拨漕粮开设粥厂,为饥民施粥渡荒。

漕粮验收流程之严

各省漕粮运到通州,在通州东门外的运河上形成了“万舟骈集”的景象,但是漕运的艰辛并没有结束,还有一个关键环节——交仓。其中,正兑漕粮在石坝码头卸粮、验米,所运漕粮米色、干湿等情况符合标准后,装船沿通惠河运到京仓收储。改兑漕粮在土坝码头卸粮,经过验粮,从土坝上岸,运送到通州各仓。

明清时期,平均每年都有三四百万石漕粮运到通州。保证其数量和质量的重任,便落在了坐粮厅的肩上。明成化十一年(1475年),户部委派1名员外郎,专管通州漕粮的核验。为防止舞弊,嘉靖九年(1530年),御史李循奏议由坐粮厅员外与巡仓御史共同验粮。

为确保漕粮质量,嘉靖十六年(1537年),皇帝批准各漕总运来的粮米抵达通州后,要查验其质量。坐粮厅的官员如果发现米腐坏,须将运丁呈送漕运总督衙门并移送司法衙门从重发问。不合格的漕米要及时扬晒,并由运丁赔付,坐粮厅也要追究相关漕总的责任。

清代漕粮收储制度与明代相比更加严格细致。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定制,各省漕粮起运前,先派人将各帮所载漕粮取米样1石封存,送到北京户部;再由户部分别转发至接收该漕米的粮仓。待漕船抵达通州后,将米样与漕粮比对,检查质量是否一致,防止运丁中途偷梁换柱。

清乾隆年间,江甯受在坐粮厅任职的冯应榴所邀,绘制了《潞河督运图》。画中细致描绘了验粮的场景:坐粮厅使者乘官船查验各船漕粮,一条小船迎面而来,验粮者立于船头,双手捧盘,其中所盛就是样米。

收纳漕粮时要过斛以统计数量。明朝,朝廷专门制作了铁斛作为标准计量器具,存放在通州坐粮厅。万历《通粮厅志》载:“钦降铁斛一张,见贮通粮厅。一面铸‘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’,一面铸‘监铸官直隶大河卫指挥仲纲直隶淮安府同知夏新铸匠袁宗范斌等’。”

坐粮厅的官员以铁斛为标准,先制作若干个铁口木斛,分发给各仓使用;后又制作标准斛斗发给运丁,作为标准量具,以相互校准,防止短斤少两。清代直隶总督李绂,曾于雍正元年(1723年)受领催办漕务,著有《漕行日记》专门记载此次经历。他采用“重赏重罚,行之以信”的方法,广贴告示于沿河村庄军民铺户,若发现有买盗米者,立即捉拿追究;凡折耗之米,俱令买米之人赔补。如此做法,自然没有买米之人,船户即使有盗米,也无处销赃,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偷盗漕米的问题。

对漕粮检验流程的严苛,还造就了一套漕运史上独特的“密码系统”。现在通州区博物馆保存的“镇馆之宝”之一——军粮经纪密符扇,就是专供验粮官员使用的“密码本”,堪称古人智慧的结晶以及漕运文化的重要见证。

这把密符扇是一副扇面,两面各有50个密符,符号下方有相应的中文释义。密符扇上共有密符100个,其中包括地名、舟名、车名、瓜果蔬名、人名、鸟兽虫名等。其中以地名命名的密符只有一个,便是“通州”。该密符由两个十字并排在一起,很像一个草字头。这种画有全部密符的扇子当时掌握在验粮官手里。在检查军粮经纪查完的粮食时,如果发现有的粮食不符合标准,就会根据袋子上的密符找出军粮经纪的真实身份,可以说这是一本加密版的点名册。

通仓,是明清时期设立于通州的漕粮仓库总称,为京杭大运河漕运存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州城的城市格局与多次建设,均与保卫和服务粮仓有关。“夫积贮者,天下之大命也”,粮食储备关系重大。从河道、闸坝,到码头,无数漕粮通过大运河运抵北京,时光荏苒,当年的“运粮河”和粮仓都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“通仓”作为通州漕运仓储文化的重要载体,如今仍是我们阅读那段漕运历史的珍贵见证。



本版摄影 常鸣